

# STS 的双重涵义

——马丁·皮克斯吉尔对话希拉·贾萨诺夫

马丁·皮克斯吉尔<sup>1</sup>[著],希拉·贾萨诺夫<sup>2</sup>[著],武晨箫<sup>3</sup>[译]

(1.爱丁堡大学,英国;2.哈佛大学,美国;3.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要:**希拉·贾萨诺夫与马丁·皮克斯吉尔探讨了 STS 的两种竞争性涵义:“科学技术学”或“科学技术与社会”。贾萨诺夫回顾了她进入 STS 领域的历程,以及她尝试融合两种不同传统的方式。她的智识和职业生涯由制度环境和个人选择共同塑造,并映射于她在形塑 STS 网络、项目和院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贾萨诺夫强调了这一领域学科化的必要性。对她来说,STS 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走近和参与世界的方式。这种独特性需要通过富有创造性而又严格的教学和训练来精心培育和传承。马丁·皮克斯吉尔对此次对话内容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科学技术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学科性

[中图分类号]G301;N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1)03-0010-11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1.03.002

S(&)TS: Martyn Pickersgill Talks with Sheila Jasanoff

[Interviewer] Martyn Pickersgill<sup>1</sup>, [Interviewer] Sheila Jasanoff<sup>2</sup>, [Translator] WU Chen-xiao<sup>3</sup>

(1.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2.Harvard University, USA; 3.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Sheila Jasanoff and Martyn Pickersgill discuss the contested meanings of STS, defined as eit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he interview describes how Jasanoff entered STS, and the ways in which she sought to bring together different traditions within the field. Jasanoff underscores how her intellectual and professional journeys were shaped through a mix of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personal choices, and reflects on the role she has played in shaping STS networks, programs, and departments. Jasanoff remains excited about the future of STS. For her, STS represents a distinct mode of researching, approaching, and engaging with the world. This distinctiveness needs to be carefully cultivated and reproduced through creative but rigorous teaching and training. A reflection by Martyn Pickersgill follows the interview.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disciplinarity

收稿日期:2021-03-30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20191080563);中国科普研究所委托项目(190101ELR087)

作者简介:马丁·皮克斯吉尔,男,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教授,Email:martyn.pickersgill@ed.ac.uk;

希拉·贾萨诺夫,女,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教授,Email:sjasan@fas.harvard.edu。

译者简介:武晨箫(1991—),女,北京人,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政策、科学文化研究。

## 访谈者简介

马丁·皮克斯吉尔是爱丁堡医学院(Edinburgh Medical School)生物医学社会研究领域惠康信托基金学者(Wellcome Trust Reader)。他的研究考察了科学和医学知识的国际流动及其在卫生保健、法律政策和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案例。皮克斯吉尔特别关注神经科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和历史维度。这些研究为心理健康实践中的社会技术创新、临床和实验室工作规范的(共同)生产,以及与新认识论相关的主体性结构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皮克斯吉尔获得了许多机构包括惠康信托基金、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和英国科学院的资助和研究奖金。2014年,他参与创办的科学知识和政策中心(The Centre for Science, Knowledge and Policy at Edinburgh, SKAPE)成立,并担任副主任。目前,皮克斯吉尔正参与创建一个新的生物医学、自我和社会中心(Centre for Biomedicine, Self, and Society)(惠康信托基金提供了100万英镑的资助)。他致力于与不同领域的各类行动者进行形式多样的交流,并在酒吧、影院、医院等场所参与对话活动。皮克斯吉尔越来越多地将公众参与本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2015年,爱丁堡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授予他亨利·邓肯奖章(Henry Duncan Medal)。

## 受访者简介

希拉·贾萨诺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技术学方向的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er)教授。她的研究探索了科学技术与现代民主国家的法律、政治和政策相互作用的方式,尤其关注公众理性的本质。贾萨诺夫强调科学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生产”,并将“社会技术想象”和“生物宪政”(bioconstitutionalism)等概念引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贾萨诺夫拥有数

学、语言学和法学学位,并且凭借对美国、英国和德国有毒物质监管的跨国研究进入STS领域。该工作展现了政治文化如何形塑证据的产生和部署,以及政策制定中对专家知识的承认和磋商。而后,她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国际比较研究,包括博帕尔(Bhopal)、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全球环境运动。她曾担任康奈尔大学STS系创系主任,还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例如4S会长,并定期与非STS学者合作,撰写面向非STS受众的文章,如科学家和更加广泛的公众,且利用STS的洞见分析并形塑在科学政策中存在争议的问题。

## 一、“科学技术学”还是“科学技术与社会”?

马丁·皮克斯吉尔(Martyn Pickersgill,以下简称MP):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STS?在英国,我们所说的STS一般是“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但是在美国也有“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说法。您认为STS是什么的缩写?对您来说,这一缩写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以下简称SJ):我对这一缩写采取一种独特的立场,因为我是通过康奈尔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A Program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进入这一领域的,而后在我的带领下,这个项目成为科学技术学系(A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这本身也许并不独特,但当我加入哈佛大学时,我不得不考虑建立一个新的STS项目,因为当时哈佛大学并没有STS项目,这也让我必须再次反思这一名词的涵义。最终,我选择了“科学技术与社会”,而非“科学技术学”。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思考,是的,名称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过于强调其重要性,作为一名学者,是实践决定着您真正在做什么。时至今日,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这样认为。但我改变了对两种STS的看法,

因为它们的谱系不同,用一种综合的方式思考两者的差异创造了我认为我所代表的 STS。因此,我希望 STS 同时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和“科学技术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在美国起源于社会的忧虑。这些忧虑部分来自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战运动、环境问题以及一些与技术 and 现代性相关的大问题。我不得不说,美国的思想家并不处于忧虑现代性的前沿。现代性与技术理性主义相关,这构成了德国社会理论家的全部思考,福柯(Foucault)和法国其他社会理论家的理论也是一样的。相反地,美国的 STS 始于对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和环境运动、军事—工业联合体以及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还始于对身份政治,如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种族和性别问题的思考。因此,美国在发展科学技术学的批判种族理论、批判性别研究,甚至批判法律研究等方向扮演了主要角色。而欧洲方面兴趣的焦点则更加集中于知识是什么、知识如何与物质联结等哲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技术学将科学技术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科学技术与社会则将科学技术作为与世界其他部分存在联系的对象进行研究。因此,当我建立康奈尔大学 STS 系时,我非常明确地尝试将这些问题汇集在一起。联系特雷弗·平齐(Trevor Pinch)是一个单方面的决定——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我的选择,因为当时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那是一次拉近大西洋两岸距离的明确尝试的一部分。我们选择将康奈尔大学 STS 系命名为“科学技术学系”有其自身的政治原因,我很乐意告诉你其中的原委。但对我来说,这通常意味着将我认为必须同时追求的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近来,我常常说,对我们而言,STS 是最能深刻反映科学的、技术的文明意味着什么的领域。这要求我们思考科学和技术的特殊性在哪里,这是科学技术学的组成要素;同时也要求我们思考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其他部分意味着什么,这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注内容。因此,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不

可兼容”(either/or)的问题,而是一个“齐头并举”(both/and)的问题。我坚持认为,对我来说,将社会纳入 STS 是这一领域存在的终极理由:这不仅是简单地用我们学科的特殊语言来重新描述科学,也是我们用特殊方式反思什么是理性社会(rational societies)、制造型社会(manufacturing societies)或发明型社会(inventive societies)的载体。

**MP:**最初您是如何进入“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一领域的?

**SJ:**这是一个曲折的故事。我与我的丈夫在博士阶段受到的都是历史语言学训练,我们面临着双职工问题,事实是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晦涩难解的领域获得具有同等挑战性的工作。我的历史语言学博士论文是关于孟加拉语的形态学史研究,这不是美国学术界最流行的语言。因此,在经历了许多痛苦后,就在我获得博士学位的同一年,我又进入法学院学习。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是一场交易,我要更专业地追求它。因为杰伊(Jay Jasanoff)<sup>①</sup>工作的原因,我们留在了剑桥,他作为初级教员在哈佛大学教书。家里对我去法学院的看法是:好吧,这样做也没什么坏处。但当我毕业时,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公司法不感兴趣,也绝不会践行它。幸运的是,我的一位法学教授帮助我进入一家小型环境法事务所工作,我开始在波士顿从事环境法的相关实践。然而此后,学术、就业市场还是打击了我们。也由于杰伊的工作原因,我们必须搬到康奈尔去,搬到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伊萨卡去,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镇,那里没有让我继续进行环境法实践的机会。在那段日子里,以实践为导向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者,其中也包括一些律师,正投身于环境运动。结果我发现,我所在的小公司中有一位律师——那里仅有我和三位搭档——知道多萝西·内尔金(Dorothy Nelkin)在反核运动和其他争论中所做的工作,他向我介绍了多萝西·内尔金。1978 年春天,在去康奈尔大学面试时,我与

STS项目的学者进行了交流。他们用仅剩的少量创办经费为我提供了一个兼职博士后职位。与此同时,当然,我必须跳进那个我从未接受过训练的圈子。我必须写一份博士后阶段的研究计划,曾在哈佛大学遇到的一个人建议我研究环境法立法的最新进展,即《有毒物质控制法》(*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TSCA)。因此,我在研究计划中提到我将考察TSCA的实施情况,结合我曾任环境律师的工作经历,这一计划是有意义的。受到康奈尔大学STS项目软资金支持的三位独立的青年研究者共同向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递交了一项提案,旨在研究欧洲和美国的化学制品监管。他们提出将法国、英国和美国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有两位申请者是美国人,其中一人会说法语,另一位申请人来自英国)。NSF将提案寄回并指出,他们喜欢比较研究,但这个研究需要法律专家,并且要将德国囊括进来,所以还必须有一位有能力对德国进行研究的人。恰巧我拥有哈佛大学的法学学位和相当多的德语知识,并且正打算研究化学制品,而这些人也希望通过研究化学制品来引入德国的做法和相关法律。因此,我来到康奈尔大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他们重新修改提案,这基本上开启了我接下来的整个职业生涯。

## 二、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MP:**你接管了系所,并将它从一个STS转变为另一个STS,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吗?

**SJ:**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一举措都是独一无二的。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也不认为以后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我根本没有“接管”一个系所。在我来到康奈尔大学的十年后,我成为STS项目的主任——我确实承担了主任的职责,但并没有接管相关工作。然而,在那以前,康奈尔大学做了一些令我感到惊讶的事。1987年,在没有院系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就给了我一个终身教授职位。他们发现,并不

需要一个院系来对终身教授的职位进行授权。我认为这种情况在高校中是不太寻常的。我不太清楚,这也许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不正常。但他们利用一个特殊程序授予我终身教职,于是,我成为了文理学院的终身教授,而并不是某个系(department)的终身教授。一年后,当他们让我主持STS项目时,我成为了主任,我问学校当我就任新职位后,是否可以雇用某个人来填补因我的离开而空缺的职位。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通过各种特殊举措,我们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小的教职工团体,包括三位资深教授和一位初级教授,他们不属于任何院系的教职人员序列;此外,还有我能够组织起来的来自各处的附属人员,但他们不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力量。我必须强调,这仍然是一个项目(program),而不是一个系(department)。没有自己的教职人员序列通常是项目的显著特征之一。我们有自己的人员序列,这对于一个项目来说是反常的。后来,NSF联系我说他们正在开展一项针对STS研究生培养的竞争性资助,我有能力将十余位教研人员组织成教师队伍并申请这个资助。六个月后,NSF打电话给我,至少是这一资助的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我说:“希拉,有一个坏消息是你没有得到这项资助,但也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已经说服了生物学部的领导”——这项竞争性资助正是由他领导的——“他们应该会增加一个资助名额,我们希望你重新申请”。因此,我们重新进行了申请,整个过程经历了几年,但最终我们拿到了这批巨额资助中第二高的经费,将近100万美元。在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现在来看,这仍然是相当多的一笔钱。以此作为基础,同时也为了改变反常的状况,康奈尔大学继续进行着一场过去就已经开始的讨论:是否将这一奇怪的附属品(STS项目)归入教务长办公室,并将其转变为一个完整的系。这一讨论又持续了一年——因此,1988年,我成为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的主任,1991年,我们获得NSF的培训经费资助,文理

学院投票决定将这个项目发展为一个系。在我印象中,STS 系由 14 位等同全职(full time equivalents)的工作人员组成,其中 6 人获得了这个新系的全职职位。其他人由我系和其他院系联合聘任,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代表了 8 个不同的领域。因此,命名法是最不重要的。我们有一位土木工程师,一位经济学家,三位哲学家(其中两位是道德哲学家,一位是科学哲学家),三四位历史学家,一位生物学家,一位社会学家,我自己则受过法律方面的训练。如何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并构建一个具有连贯性的工作智识团体?——这可比决定这个系应该叫什么名字难多了。

**MP:**当时对您来说,在欧洲传统下进行的研究工作重要性如何?美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传统与欧洲的传统有没有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欧洲传统,但实际上这一传统并不局限于欧洲地区。特别是美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与英国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这两种传统之间是否存在很大的差异?

**SJ:**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特雷弗·平齐与我和其他人一起促成了这一转变,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就来自英国的 SSK 传统。我和特雷弗在一起已经共事很多年了。大约从 1990 年起,我邀请他加入第一版——我所认为的——严谨的 STS 手册的编委会,自打那时起,我就开始和特雷弗一起工作了。通常,人们称之为第二版 STS 手册。但就某些方面而言,第一版手册并不能算作整个领域的第一版。特雷弗与我和两位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同事共同编辑了这版手册。因此,我一开始就致力于在美国传统与欧洲传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当时我并不十分了解欧洲 STS 的不同分支,那时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并没有那么明显。在那段日子里,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巴斯学派(The Bath School)正在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交流,正在与技术的社会建构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那群人交流。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人们追求统一的使命感更加强烈,但在那之后,他们逐渐分裂成各种不同的流派。与其他进路相比,SSK 本身更为突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尚未成为大西洋彼岸 STS 领域的领头羊。然而,如果你去看 1995 年 STS 手册的目录,你会发现学者的来源是相当广泛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绝不是美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手册”,而是一次想要把握整个国际领域的严肃尝试。现在我不记得当时所有的学者都是谁了,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英语世界的一种过度代表(an over-representation)。布莱恩·温(Brian Wynne)撰写了公众理解科学那一章,史蒂文·耶利(Steve Yearley)撰写了关于环境的那一章,马尔科姆·阿什莫(Malcolm Ashmore)撰写了 STS 新文学形式的那一章。因此,参与 STS 手册编写工作的英国学者的异质性很强,相比而言,欧陆学者的多样性稍弱一些。但我由衷地认为,现在的欧陆传统比以前更加明朗了。这本书应该成为大西洋两岸学者所共用的手册。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的意图。

### 三、将 STS 学科化

**MP:**对您来说,STS 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领域的?

**SJ:**有一些人会说,STS 从未成为一个领域,因此,它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领域对那些入而言仍然是一个问题。你知道系谱(genealogies)是怎么回事。你可以指着美国《独立宣言》说,自那时起美国就成立了。但你也可能会说,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重建之时,美国才真正成立,因为在那之前,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还没有获得选举权。或者你也可以说,直到女性获得选举权后,这个国家才算成立。那么,美国是什么时候成为了由 50 个州组成的美国?所以,这样类比的话,我认为一个好的领域应该是一直在形成过程中的领域。一个领域的形成需

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并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日子,或发生了一件特定的事件就形成了一个领域。1976年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4S)会议首次举行的日子。那时,人们开始感到STS与其他以科学技术为导向的专业社团有所区别,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显然,创建STS项目的意义愈发重大。曾经有一段时间,科学元勘小组(The Science Studies Unit)是英国唯一的同类机构,但科学元勘小组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2016年,人们正在庆祝它成立50周年,但此时它已经不是当时那个科学元勘小组了。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纪见证了一个增长的高峰期。看待这一现象的另一种方式是,各国纷纷成立了自己的STS学会。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我认为,在STS最初形成的20世纪7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段时间里,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使强纲领和科学元勘小组得以发展。顺便说一句,NSF的工作人员迫切地希望能够资助那些研究生培养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工作人员将科学元勘小组视为标杆。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提供给你的细节。对于STS训练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我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想法,这个想法与当前盛行的想法不同:促使科学家和工程师思考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不管你来自哪个分支领域,是主题(topic)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STS领域的形成阶段,90年代早期是巩固的高潮,而后2000年左右是全球扩散时期。然而,全球扩散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碎片化(fragmentation),因为你最初提出的问题——是“科学技术与社会”还是“科学技术学”——仍未消解。同时,由于某些研究框架现在更加强势,如行动者网络理论,STS向其他学科的扩散也反过来影响着STS领域的现实情况。所以,我认为,讽刺的是,与许多其他领域相比,我们更加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因为当今世界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知道什么是STS,也就是说,他们

对这一缩写的意义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他们甚至雇用受过这种训练的人。但关于STS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这一领域尚未完成反思的整合,还在进行内部综合。

**MP:**您认为这样做有多重要?

**SJ:**我想,如果我们要争取学术空间的话,这是极为重要的。人们可以不同意这一点,学术界肯定会有激烈的声音说,就像曾经因为女性受到了忽视所以我们需要女性研究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因为科学技术被忽视了所以我们需要科学技术学研究。然而现在,看看任何一个高校的人类学系,他们进行科学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研究;看看那些历史系,他们正用历史的方法研究相同的事情;再看看哲学,尽管一直都有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但他们同样也提出了新的想法,使用了新的材料。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因此,为什么我们需要所谓的STS?自称为STS研究者是一种催化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非常重要且有趣的,但现在这一学科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自己承担起这一切。我坚定地相信事实并非如此,但我不能确定有多少同事在这方面同意我的观点。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的原因是多个层面的。第一,从经验中你可以发现,那些对知识和想法、人工物和物质性以及古典学科感兴趣的人往往趋向边缘化,他们只能自娱自乐。在主流学科的探索工作中,被雇用的都不是这几类人。你刚才提到你即将要去蒙特利尔。我曾去过那里,但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社会学系已经与将知识社会学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这一做法渐行渐远,更不用说医学社会学这样的专业学科了。因此,我并不认为那些经典学科,那些已经有了他们自己认定的研究重点的学科,能够将科学和技术充分融入到他们的焦点主题之中。如果你认为你的主题是文化、年表学、社会组织或金融交易等,那么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不会突然转向并声称我们将把你们的主题——知识——作为我们关注的中心。因此,如果你

认为科学、技术和知识非常重要,那么你会去哪里研究它们呢?可能无法在那些已有的学科结构中找到答案。我与此相关的第二点考虑是,STS 是一个与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骨干精英有着巨大关联的领域,它不仅只关系到正在进行 STS 研究的学者。我们知道,人文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序的,大多数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生可能对西方文明史这种课程没有兴趣,除非他们不得不上这门课程。但是,如果能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一些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将愿意学习关于计算机科学的社会学,或是一门关于计算机科学的伦理、法律或社会研究的 STS 课程。例如建模,他们可能希望了解 STS 学者对模型中一些思想的洞见。许多受到科学训练的人并不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最终被局限在板凳之上,而是渴望能够着眼于整个世界。相较于从文化人类学中拾取点滴知识,或从战争史中了解军事技术,对他们来说,STS 是一条更实用、更有希望帮助他们了解这个世界的途径。最后,我认为,三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和理论问题,这是其他领域不具备的特性。我做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来阐述“共同生产”(coproduction)这一概念,现在这个词汇已广为流传。人们可能会误解它,或者以一些我并不认同的方式应用它,但这是一个用独特方式思考世界的例子,源于我们想要解释某些事情的期望。与此相似,我与金尚贤(Sang-Hyun Kim)一起编辑了一本书,<sup>②</sup>这本书与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有关,现在人们已经相当广泛地运用这一概念。这本书作了一个小小的判断。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提出“想象”(imaginaries)的思想,人类学学者提出“想象”的思想,但如果你去看探讨“想象”的经典著作,就会发现,社会对未来的预测很少包括,甚至完全没有科学技术的内容。这是十分离奇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没有谈论科学技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没有谈论科学技术;阿尔让·

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没有谈论科学技术。但是现如今,现代社会关于未来的想象怎能不包括科学技术?我认为,社会技术想象将会吸引许多人,因为他们将不断发现,是的,使用这一概念将得到一些收获。但在 1978 年,当我从一名律师转变为一名受到软资助的 STS 项目成员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经意的发现、进行整合的尝试、对命名方式的探寻,所有这些都在我思考和写作过程中逐渐推进。我将这些发现传授给别人,因为我与那些同样有兴趣将科学技术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同行。因此,我确实发现,就对 STS 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投入程度和热情程度而言,我并不孤单。但我可能是少数,甚至在我自己所处的领域中,我可能仍然是少数。然而,这并不会降低我的投入程度,我觉得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对社会进行我认为必要的批判性反思。

#### 四、扩展问题和联系

**MP:**如果将 STS 作为一个学科来考虑的话,您希望它在未来如何发展?

**SJ:**我想,我们必须更加注重训练,我们必须训练人们在智识上更加慷慨和仁慈。你可能记得,从你在这里的时候起,我就喜欢用“认知仁慈”(epistemic charity)这个词。我认为,STS 学者同时遭受着专业化不足(inadequate specialization)和高度专业化(hyper-specialization)的折磨。我们必须采取这样一种立场:既认识到这一领域内部的异质性,又认识到它与外部的联系。内部异质性意味着你不应该过早地判定 STS 是 SSK、STS 是 SCOT,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但你应该意识到,正如你在一门专业的编史学课程中那样,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提出关于科学技术的基本问题:它们是什么?它们如何联系在一起?等等。我不认为一些人能称得上是 STS 学者,除非他们了解我们这个领域的文献,了解这个领域的发展历史。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良好的训练。但与此同时,如果

我们不能就这一领域与其他相邻领域的关系达成共识的话,那么 STS 就会成为一片贫瘠的土地。大多数 STS 学者认为,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正义、平等没什么话可说,对为什么赢家能赢、输家必输的大部分核心规范问题也无话可说。甚至当我们的共同体学习经济学时,我们也趋向于关注工具,而不是将市场视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存在,也不去思考对于社会来说,依赖市场意味着什么。因此,我希望看到一个这样的 STS:广泛地认识到自身是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充分尊重自己的传统,能够向人们全面介绍我们自己的系谱。而后,如果有这样的系和这样的项目的话,那么它们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变化。我认为这些变化并没有错。例如,爱丁堡大学成为研究金融工具的核心阵地,因为金融工具在那里是一门专业,人们在爱丁堡大学发展了金融工具。而其他一些地方则可能重点关注性别问题或发展问题。但人们应受到共同的训练,这样一来,当人们见面时,即使不打手势,大家也能够意识到彼此属于同一个智识群体。这就是我创建科学与民主网络(The Science and Democracy Network, SDN)的原因。我用创建这个词,虽然这听起来过于刻意,但我并不是刻意为之的。2002 年,我邀请了三十多位朋友和同事,启动了这项工作。今天,成员人数几乎翻了十倍,如果我们允许的话,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到一千人。SDN 成员相互熟识,就共同使用的概念和人们提出的问题达成共识。他们将 SDN 视为引力场的智识中心,一个对人们有着极大吸引力的地方。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所有的会议都是全体会议,人们非常高兴地并肩而坐,聆听其他人的报告,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评论。这并不是按照主题或时间来定义的。实际上,这是按照人们提出的各类问题来定义的。我认为,显而易见地,SDN 应当算是 STS 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并不要殖民整个领域。事实上,我希望 STS 成为像历史学那样广阔、充满活力、兼容并蓄的领域。

在这里,我们的领地是最大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拥有同样丰富的专业和课程。但是应该有这样一个核心部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要关注我们自己领域的历史,对构成要素的来源及其优劣势的尊重性理解——人们提出了哪些批评。人们正在遗忘一些争论,例如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和 SCOT 的争论,但这些争论是我们领域的一部分。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将股票交易或气候模型作为一种技术来讨论,我们仍然应该理解为什么人们认为黑箱是重要或不重要的,以及人们打开或没有打开黑箱的原因。我希望 STS 能够朝着学科的方向发展。我所理解的学科能够从内部对话而非整体连贯性中获得力量,就像学科能够在外部交流中有所收获那样,学习其他人如何处理我们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知识社会”是社会学家使用的术语,但他们质询知识的方式可能与 STS 学者不同。

**MP:**您也提到了 STS 方法的独特性,在英国,人们常常就“什么是 STS 方法?”这一问题发生争论,所以,到底什么是 STS 方法?!

**SJ:**难道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不会问这个问题吗?首先,和其他任何领域一样,在我们的领域中也发生过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之争,也有过解释方法与经验方法之争。我认为,时至今日,STS 确实已经确定了一些重要的方法。实验室研究和争论研究都是我们在以特殊的方式做特殊的事情。争论研究导致了方法论相对主义或方法论不可知论,我想这是我们独特的方法,在这种意义上,强纲领得以幸存。我想,对称性和反身性是我们元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元方法体系的一部分,这些是我们所特有的。“共同生产”虽然没有提供方法本身,但提供了很多关于我们何时观察以及我们看到哪些事物的方法论切入点,我认为它超越了争论研究。因此我说,在《知识的态势》(*States of Knowledge*)这本书关于“共同生产”的章节中,我们应当看到动荡的时刻和重建稳



定的时刻、起源的时刻和争论的时刻。“共同生产”囊括了人们应在何时何地进行研究的全部选项,所以对我来说,争论是“共同生产”研究的一个附属部分。当然,历史学家会说他们关注起源,但我们研究的是知识文化和人工物文化的兴起,这与他们不同。我们说历史学家可能关注事情发展的一些时刻,如后殖民身份认同或类似的事情,也包括知识和信息,这些在我们的研究中也会有所涉及。但我们会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材料。所以我认为,这些方法处方也可以转化为一些问题:作为一位 STS 学者,你应该如何查找档案,你认为档案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是什么,你将如何进行访谈,你的访谈对象是谁,等等。如果你想做到真正的对称,那么这将对访谈策略等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在“共同生产者”这一主题上,我们应该关注表征、话语、制度和身份认同的融合,我认为这是一种方法论处方。如果你追随福柯,你可能会关注话语;如果你追随拉图尔,你可能会关注表征;如果你是批判性研究的一员,你可能会关注身份认同。许多 STS 研究者并没有同时对制度进行研究,而其他事物正是通过制度体现出来的。所以我认为 STS 的方法是,“对不起,不,你必须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到一起看”。我希望看到未来的 STS 学者能够把这点融入他们的骨髓之中,拿出坚持信念的勇气,而不要被其他进行相同研究的人发表的论证或断言所迷惑。那么,这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想,特别之处可以用一个地理学的类比来说明,不是你在一座没有其他人的孤岛上做你正在做的事情,而是你已经到达山顶,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事实上,如果你认为自己就像是坐在洞穴或筒仓里,那么我并不认为知识是令人兴奋的。正是在这种与其他观察方式的流畅对话中,知识才获得了意义。所以,我认为,我也经常这样教我的学生,STS 有自己的提问方式,通常与其他人的提问方式不同。人们可以培养出一种不言而喻的感觉,“我在做的事情

和你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重申,某些事情是方法论层面的,例如,对争议或特定场点的关注,这是我们所特有的方法,而不是别人的。

MP:谢谢!

## 访谈后记:ST(&)S

——马丁·皮克斯吉尔

2015 年 2 月的一个早上,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我冒着冰雪艰难地走向希拉·贾萨诺夫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住处。马萨诸塞州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暴风雪,航班被取消,哈佛大学停课。尽管如此,贾萨诺夫的一天仍然非常忙碌。当我到达她家时,她正在为一个 Skype 会议做准备,这个会议将在我离开后不久举行。我踢了踢靴子上的雪,随后坐在她的厨房里喝着热茶。我暖和过来了,我们开始聊天。

### 一、建设这一切

贾萨诺夫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名,其中之一是作为一名建设者(尽管她认为这种说法对于她所做的一些事情来说太过“刻意”)。正如她所回忆的那样,1998 年来到哈佛大学时,她“不得不考虑建立一个新的 STS 项目,因为当时哈佛大学并没有 STS 项目”。如今,以肯尼迪政府学院为基础,哈佛大学有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这正是由贾萨诺夫领导的。这一项目为文理研究生院的博士生提供了 STS 的二次场(Secondary Field),并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

研究网络、中心和学科的建立等关键话题贯穿了我与贾萨诺夫的谈话。十分明显,阐述其他领域进行知识生产的社会维度与 STS 学者自己讲述的故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贾萨诺夫事业的核心——以及在著名高校中担任职位所能提供和依赖的研究——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制度的、经费的、认知的和学院的支持编织

在一起。正如这次访谈所展现的,编织者和被编织者之间并不总是“不可兼容”的;一般来说,它们是一种更为模糊的(有时是矛盾的)“齐头并举”的关系。

贾萨诺夫用这些术语来探讨她眼中的“STS”代表什么这一(正在进行中的)问题。她描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在美国起源于社会的忧虑”——例如,对战争和环境的担忧。从表面上看,贾萨诺夫在康奈尔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时首次接触 STS。然而,她对 STS 作为“科学技术学”的兴趣——贾萨诺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技术学将科学技术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一直很明确。在“两种 STS”之间的穿梭是她学术成就的标志。正如她所说的:“我希望 STS 同时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和‘科学技术学’。”作为不同进路之间的联结点,贾萨诺夫的工作同时促进了这两种传统的繁荣。

## 二、交缠的进路

贾萨诺夫在康奈尔大学的经历展现了职业、学者、中心和学科之间相互促进的过程。她谈到自己的偶然发现:在进入一个机构时,她的专业知识和同事的专业知识能够卓有成效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一个“可行的”(doable)研究问题<sup>[1]</sup>。随着时间的推移,贾萨诺夫将努力工作、学术志向、社会关系、制度支持和“各种特殊举措”结合在一起,为康奈尔大学 STS 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91 年,NSF 提供了 100 万美元的培训资助,帮助完善相关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文理学院投票决定将这个项目发展为一个系”。毋庸置疑,STS 系的建立在该领域自身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现如今,几乎所有高校中设置的 STS 机构全都涵盖了“两种 STS”中每一种传统的要素——无论它们被正式命名为“科学技术与社会”(与美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还是“科学技术学”(一般来说与欧洲进路联系在一起)。鉴于她个人的智识取向,推进 STS 内部不同共同体

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对于贾萨诺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回顾她担任《科学技术学手册》<sup>[2]</sup>的主编时,她提到:“我一开始就致力于在美国传统与欧洲传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当然,任何一种传统都发展出各种进路。例如,在英国,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正在爱丁堡和其他地方进行,而激进科学运动(The Radical Science Movement)正在伦敦等地紧凑地进行<sup>[3]</sup>。将这些不同的视角(和它们的编史学)汇聚在一起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贾萨诺夫看来,“对我们而言,STS 是最能深刻反映科学的、技术的文明意味着什么的领域。”这“要求我们思考科技的特殊性在哪里”和“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其他部分意味着什么”。这一智识课题需要我们与其他学科和话语领域进行持续交流,即便在 STS 的地位和风格得到完全发展和完善后,也需要保持这种交流。

## 三、将 STS 学科化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见面那天,贾萨诺夫正忙得不可开交。尽管暴风雪肆虐,但这也不足为奇。生产力、速度和成果,愈发被理所当然地(可能有时也受到抵制)当作学术生活的特征<sup>[4]</sup>——贾萨诺夫是一个特别忙碌的人。与此同时,她也因为学术交流构建了巨大的空间而闻名,这对于学术生涯刚刚起步的年轻学者来说也许更加重要。这包括国际科学与民主网络,也包括哈佛大学 STS 项目。

这个项目本身也提醒我们 STS 如何成为高校的“中心”。虽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院系的教员中,通常都会有一位或多位 STS 方向的学者,但跨部门的 STS 项目、机构和中心仍十分少见。这对师生关系、学术研究和训练都产生了影响。贾萨诺夫认为,在 STS 领域,“我们必须更加注重训练”。强调自己致力于与年轻学者接触(并促进他们之间的对话),她提到,“我们必须训练人们在智识上更加慷慨和仁慈。”

STS 本体论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但贾萨诺夫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希望 STS 能够朝着学科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既要为那些更多地以历史、工程等传统方式了解世界的学生提供 STS 选项,也要培养希望获得 STS 学士学位的本科生。

一些高校,如康奈尔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采纳了贾萨诺夫的建议。另一些高校,包括爱丁堡大学,则在为本科生开设一些相关课程的同时,为研究生设立专门的 STS 学位。这样的层次结构将如何发展出关于 STS 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特定图景?关于高校学位设置的讨论通常有着实践(和经济)导向,聚焦于谁可能教授什么课程,哪些学生可能选课,以及他们愿意支付多少学费等具体问题。正如我们从 STS 中所了解的,正是这种关注形塑了领域的发展和知识的生产<sup>[5]</sup>。

#### 四、在形成之中

贾萨诺夫提到,对她来说,“一个好的领域应该是一直在形成过程中的领域。”显然,STS 就是一个不断形成和再形成的(交叉)学科,因为学者们开始审视越来越多的实证案例,并进一步扩展和完善概念工具包。贾萨诺夫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学术成就是知识和社会秩序“共同生产”的例证。对于“共同生产”这一概念,她在其他认识论领域进行了十分细致的阐述<sup>[6-7]</sup>。随着 STS 的发展及所处社会的不断变化,我们不禁要问: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 [注释]

- ① 杰伊·贾萨诺夫是希拉·贾萨诺夫的丈夫,现为哈佛大学语言学系教授——译者注;摘要有删改,原文链接为:  
<https://estsjournal.org/index.php/ests/article/view/226>。
- ② Jasanoff S, Kim S H. *Dreamscapes of Modernity: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Power*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译者注。

#### [参考文献]

- [1] Fujimura J. Constructing “Do-able” Problems in Cancer Research: Articulating Alignment[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87, 17(2): 257-293.
- [2] Jasanoff S, Markle G E, Petersen J C, et al (eds).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M]. London: Sage, 1995.
- [3] Edge D. Reinventing the Wheel[A]//Jasanoff S, Markle G E, Petersen J C, et al (eds.).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M]. London: Sage, 1995: 3-24.
- [4] Müller R. Postdoctoral Life Scientists and Supervision Work in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A Case Study of Changes in the Cultural Norms of Science [J]. *Minerva*, 2014, 52(3): 329-349.
- [5] Capshew J H. *Psychologists on the March: Science,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America, 1929-1969*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6] Jasanoff S, ed. *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Social Order*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7] Jasanoff S. *Designs on Natu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